

无问西东五十载，可知同学非少年？

○王贵祥（1972级建筑）



二〇〇三年，王贵祥在故宫
体仁阁测绘

2025年是我们这些1972年春季入学的二字班同学毕业离校后的第50个年头。毕业后，我和一些同学去了青藏铁路建设一线，希望为将铁路穿越青藏高原直通拉萨出一点微薄之力。遗憾的是我被分配在相当于全线大本营的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市，做的是沿线场站的选址与站房等的设计工作。这使我缺失了许多其他同学在自格尔木至拉萨沿线高海拔地区经历的许多极其艰苦却值得记忆终生的人生体验。

但有一点也还算是幸运的，在这一期间，为了拉萨站的选址，我曾跟随一些老同志坐卡车去了一趟拉萨，一路经历的风雪与高寒，也算对沿线同学们曾经生活与工作过的艰难环境有过一点体验。

在站场队，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车站及其配套设施的建筑设计。不过在这样一个综合性专业设计院，只做建筑设计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房建组的技术人员似乎都应该做到建筑、结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算勉强过关。我们学建筑的，在结构上

是弱项，为了适应铁路专业设计院的这一特点，那期间我花了相当大的气力补读结构方面的书。除了复习结构力学、钢筋混凝土结构等从学校带来的相关教材之外，也向同事借阅，自学了土力学、弹性力学等。也正因为这一点，一段时间内，我对结构计算与设计似乎颇感兴趣，还顺利承担了沿线一个站点高有8米、重达数吨油罐支架的结构计算与设计，以及某座公共建筑物地下防核爆设施的结构计算与设计。只记得那时的大量结构计算，用的都是计算尺与手摇计算机，这样的做法，不仅要花相当长的时间，还留下厚厚一沓计算稿纸。

1977年恢复高考，紧接着而来的1978年又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我内心深处渴望读书的热血又再一次涌动了起来。当收到清华大学建筑系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才感觉到自己多年来心心念念的读书梦，又有机缘再一次得以延续了。我读的是建筑历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近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不仅是专业上的深造，也是对建筑学专业基础的夯实。研究生期间，除了阅读大量中文建筑书刊，以及一些有关现代建筑理论与历史的英文原版书之外，还补修了本科时感觉有点缺失的一些课程，特别是研究生建筑设计课。

我的硕士论文是在莫宗江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先生的言传身教以及先生与我们闲聊时，常常提起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学术大家的学问与治学方法，令我受益终生。在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

不仅将原先被误判为南宋遗构的福州华林寺大殿，经过严密的考证，明确为五代末吴越王钱俶十八年（公元964年）所创的原构，是现存南方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实例，从而为华林寺大殿及时升格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还从其中发现了一些唐宋辽金时期木构建筑营造的控制性比例规则。

1981年7月，我被分配到了北京市一所高校建筑系任教。虽然我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建筑史，但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的教学实践却是从建筑初步、低班建筑设计、高班建筑设计，直至指导毕业设计，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也参与了多届学生的古建筑测绘课程，如先后主持了北京潭柘寺、北海团城与琼华岛部分建筑、西山团城演武厅、颐和园南湖岛等古建筑群的测绘，以及参与了孔庙与国子监的测绘。直到1991年，我带领一些教师与学生，对已经有严重歪闪的世界现存最高也最古老的应县木塔做了完整的现状测绘，总算为这座世界级的木构古建筑遗存留下了一套全面真实的记录。

我之后主持的一些古建筑测绘，是在清华任教期间完成的。其中包括五台山古建筑群、登封古建筑群、华山古建筑群，以及易县清西陵昭陵建筑测绘，北京故宫太和殿前两侧楼阁、门殿与朝房测绘，以及晋东南地区的诸多宋、金、元古建筑等一系列古建筑测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测绘图为清华主导的五台山与登封两地古建筑群申请获评世界文化遗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五台山申遗所用繁杂的英文文本，也是由我负责审阅校对后提交的。

1985年，我担任了北京某高校建筑系

的副主任，1988年被聘为副教授。接着，获得国家教委支持，去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第二次深造是在2001年去了梁思成先生等一众中国建筑界前辈曾经留学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更为幸运的是，2012年我还受到位于美国洛杉矶的世界著名研究机构盖迪研究中心的特别邀请，在那里做了三个月的研究与学习。国外的学习经历中，最令人留恋的记忆是泡图书馆。海量英文经典建筑类书籍以及一些西方历史与艺术方面书籍的阅读，不仅使我的学术视野大有拓展，也使我的英文阅读与写作有了较大提高。这些经历为之后的一些年，我将8部重要的英文建筑理论与历史性书籍译成中文出版奠定了基础。这些书籍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学家阿尔伯蒂撰写的《建筑论——阿尔伯蒂建筑十书》与德国学者撰写的《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等西方经典理论著述，以及在现代西方建筑领域颇具理论价值的英国人撰写的《建筑理论》上、下册，希腊人撰写的《现代建筑的历史编集》与美国人撰写的《西方建筑史——从远古到后现代》等。

为了在学业上再有提高，1993年我又报考了清华吴焕加先生的博士生。博士论文答辩后，学院领导有意让我留校。可惜我原来的单位不放行，后来我先后担任了原单位建筑系主任与学校副校长。只是因为过多的行政事务实在不是我的心志所在，在校领导即将换届的时候，我再一次提出要回清华的意愿。

1999年在北京召开世界建筑师大会，负责会议组织的吴良镛先生要求我帮忙做一些与会议筹备有关的辅助性外围工作。那一年几乎每周都会到清华建筑学院参加

吴先生组织的与建筑师大会有关的各种筹备性会议，并提交了一份在分会场的英文发言稿。正是在这一期间，院长秦佑国先生再一次提起我的调动问题。为此，我也再一次向原单位领导请调。经过一番努力，特别是得到了我的老师吴焕加与楼庆西两位老先生的帮助，也得到秦佑国院长与左川书记的支持，最终获得了成功。这一调动，终于圆了我自硕士研究生毕业以来就一直期待的、在梁思成先生开创的中国建筑史学领域，安心做一点真正能够实践“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性愿景。

回到清华之后，除了担任建筑历史所所长与建筑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之外，没有其他事务缠身，心境上清静了许多，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读书与研究上。有幸的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又有机会主持或参与了延续近二十年的古建筑测绘实习，并先后开出了包括“西方建筑理论史”“中西建筑文化概论”“中国古典建筑法式与制度”等几门独具清华特色的研究生课，也培养出一批颇有造诣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还与几位博士后合作，开展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直接指导过的本科生中，出现了一些后来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知名建筑师。我先后在两所院校带过的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与博士后中，目前在国内外多所知名大学任教，且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的学术性人才，就有十多位之多。当然，还有不少在一些重要的科研与设计单位，渐渐成为了可以独当一面的技术型人才。2016年，我还获得了建设部颁发的中国“建筑教育奖”，也算是对我30多年教

学生涯的一个肯定。

回清华的本意，就是希望绍继学界前辈开辟的学术事业，为中国建筑史与建筑理论的研究，尽一些绵薄之力。这一时期，我先后独立申请并获得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直至2018年退休前夕，还与我们历史所同仁，共同申请获批了一项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支持。在这几项基金的支持下，我先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基址规模研究》《明代城市与建筑——环列分布、纲维布置与制度重建》

《中国古代佛教建筑研究论集》《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消逝的辉煌——部分见于史料记载的中国古代建筑复原研究》《中国古代界画研究》等论文集与专著。

特别是在最后一项社科重大项目基金的支持下，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努力，独立完成了一部厚达1200余页，且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研究专著——《〈营造法式注释〉补疏》。这一专著的出版，或似乎可以自诩为聊以作为对梁思成先生学术伟绩做出的一点附骥之劳。在这一研究基础之上，又受中华书局之约，完成并出版了《营造法式》现代文版的全本全注全译



莫宗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王贵祥（后排左6）和工作室伙伴们在建筑馆合影

本。大约同时，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作《唐宋古建筑辞解》，也大体可以归为这一研究的副产品之一。除了这些纯学术性专著之外，还先后撰写了《北京天坛》《古都洛阳》《匠人营国——中国古代建筑史话》《古刹美寺》《中国江南园林访古》《老会馆》等一些较为大众化的建筑史书籍。笼统而言，先后出版以中国建筑史为主题的书籍有20余部之多。其中专著《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提名奖”，译著上、下册《建筑理论》获“中国建筑图书奖”，《中国古代界画研究》获“中国最美的书奖”。

此外，为了将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开创的建筑史学术事业推向深入，依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这一平台，我与所内同仁创办了《中国建筑史论汇刊》，连续出版20辑，并与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合作，创办了中国建筑史学界的专业刊物《建筑史学刊》，从而将梁思成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清华《建筑史论文集》时就一直期待有一本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专业学刊，且已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界几代学人漫长的学术期待，终于得以变成现实。

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完全放弃实践性的设计工作。我和我工作室团队中小伙伴们的设计，主要集中在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旅游、景观、寺观，及旧城改造等方面的工程项目上。有一些项目，已经成为当地的地标项目或颇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项目，时间较早者，如20世纪80年代建造的北戴河海滨建筑碧螺塔、90年代初建造的深圳世界之窗、90年代末开始建造的普陀山宝陀讲寺与万佛宝塔。时间稍晚一些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如庐山东林寺大佛景区、成都鹤鸣山道源圣城、随州大洪山

慈恩寺、洛阳栾川老君山景区、黄梅五祖寺“东山法门”、湖南芷江抗日战争受降纪念馆、开封九六零文化景观街区改造、南昌万寿宫街区旧城改造等。目前，正处于红红火火施工中的规模宏巨的山东齐河古建筑博物馆群与九江庐山杏林文化苑，也应该能够成为颇具旅游目的地潜能的全新景区。

除了新建项目之外，我也承担了一些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与重建工程，如西安大明宫麟德殿遗址保护、南昌万寿宫遗址保护与殿堂重建、昆明文庙大成殿与大成门复建和武当山南岩宫大殿、玉虚宫玄帝殿、龙虎殿与父母殿等遗址保护与复建等。要知道，能够在历史建筑遗址上，例如世界文化遗产地武当山，再现这些历史建筑，没有相当的考古与历史资料依据及相当缜密的研究性设计，几乎是不可能获批的。这些历史建筑的重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体现了我和我的团队，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上所付出的心力与汗水。

我个人的这些经历与体验，与我们班集体中的同学这些年来为国家、为社会付出的辛劳与血汗相比，无疑是微不足道的。我的同学们，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在自己的岗位上有着不凡的经历。工作与生活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与挫折，个中的辛苦、烦恼与拼搏，或也只有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深处才有着真真切切的体验与回味。虽然我们仍怀“美哉吾校旗，愿日增汝之光辉”的勃勃雄心，但如今的多已两鬓斑白，甚至有同学已先我们而去。令人不禁对这无情的岁月多生不胜唏嘘之感。既然是“欲说还休”，或也最好不再做更多的言说，只需将这感慨勉强作为这篇追忆文章的结束语吧！